

内外形势。但事实上，洋务派不仅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而且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的堤坝，使其产生了一个缺口，为西学的进一步传入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西方的哲学、政治思想开始影响中国。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成为批判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奠定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新的经济因素必然带来新的政治、思想、文化因素，也一定会对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洋务运动产生的多重后果绝对是洋务派始料不及的。

洋务运动事实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中国改变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没有达到其“自强求富”的理想目标。当时就有人评论洋务派是“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握旧物”，只“新其貌，而不新其心”。他们从未打算改变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针的指导下来进行洋务活动，其结果必然是经营管理腐败。有许多官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任人唯亲，冗工滥食。许多重要企业甚至成为封建军阀集团争权夺势、扩张割据势力的资本。

清末出国热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一艘去往美国的轮船上，三位不满20岁的中国青年容闳、黄宽及黄胜跟随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赴美留学。他们十分清楚当前大清朝的积贫积弱、摇摇欲坠的紧迫形势。因此他们怀着扶大厦之将倾的雄心壮志前往就学。虽然最终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但他回国后却做出了骄人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咸丰四年（1854）冬，容闳学成回到祖国，国内那些黑暗的现实却使他感到无限苦闷、彷徨和焦虑不安。他一度想通过“藉雄厚之财力”创办实业的方式来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不久便发现自己“志在维新，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于是决计弃商从政。

容闳在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下，于同治九年（1870）提出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基于曾国藩的地位和影响，为了引起清廷的重视，曾国藩决定由他领衔会奏，清廷迅即批准。

按理来说，留学生正监督一职应当由精通英语、擅长西学的人来担任。也就是说，非容闳莫属。但是朝中的顽固派却表示激烈的反对，为了能让留学成行，曾国藩、李鸿章又联袂领衔会奏朝廷，决定在为留学生设立的两名监督中，正监督由翰林出身、思想保守的刑部主事陈兰彬担任，副监督则以容闳任职。

同治十一年（1872）8月，第一批30名幼童（年龄定为10~16岁）抵达美国，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批量走出国门、留学西方的第一页，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中国留学生分三批按计划抵达美国。他们用自己的刻苦耐劳、勤奋好学征服了西方人，许多人的成绩甚至在美国学生之上。

据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

幼童们赴美后的积极奋进、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美国人士的好评，让容闳内心极为欣慰。但没有想到的是，支持自己实现此项“教育计划”的曾国藩却于同治十年（1871）

冬因病逝世，这一噩耗令容闳感到无限惋惜与悲痛。他说，如果上苍“赐以永年”，使之“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手创事业之收效”“其乐当如何耶”。

令容闳更加没有料想到的困难接踵而至。曾国藩的去世使他的“教育计划”失去了有力的后援，以致这些留学幼童逐渐习染西风，开始西装革履，信奉基督教，尤其是不习汉文，不再遵守封建礼节。时任留学生正监督的陈兰彬及其继任者吴子登等人便与朝廷内部的顽固派沆瀣一气，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错误做法”群起攻击。认为这些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马上将留美学生尽数撤回，“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等。

这场斗争实际上是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西学与中学之争，自始至终能够坚定不移站在支持方一边的，整个朝廷里只有容闳一人。虽然李鸿章对留学生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却也是爱莫能助。他只能在朝野的反对声中采取妥协的方针：在责令正副监督对留学生进行严加管束的同时，向美国政府提出希望能让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陆海军专门军事院校学习的交涉，希望以此培养出国家所急需的高级军事人才，同时也可减轻顽固派所施加的压力。然而美国政府却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容闳的一再努力终归无效，光绪七年（1881）夏，清廷最终做出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部留学生的决定。

堪堪功败垂成之际，容闳并不甘心就此承认自己努力的失败，他毕竟为此耗费了全部的精力。此时，自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先后赴美的留学幼童中，最小的也已满20岁。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不仅高中毕业，甚至已经考入耶鲁、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他们若是中道辍学，那将令人十分惋惜。

于是容闳向美国友人呼吁并请求他们施以援手，希望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向清政府施压，请政府收回成命，让留学生们在美国继续学业。哪怕读的不是军事院校，理工及其他高等院校也是可以选择的对象，学成归国后，一样可以帮助大清加快国家近代化的进程。

容闳的呼吁博得了美国教育人士的响应，一时之间，致清政府的函文如雪片般飘落在皇帝的案头。在这些信中，美国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及美国教育界众多名流联名呈递给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最为真诚殷切。他们在信中说：“（留学生们）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波特及众多名流希望，清政府能够收回成命，并指出：“令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矣，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

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清廷顽固派依然反对派遣留学生出国，严令这些在海外求学的孩子们必须全部克期归国。光绪十七年（1891）11月，除了坚决不归以及夭亡于异国他乡的28人外，剩下的94人回到上海。

至此，容闳心中最为华彩的教育救国之梦就这样破灭了。

虽然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本身未能善始善终，但也未遭完败，因为这百余名归国留学生仍然在为祖国的富强奉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因而容闳后来说：

今此百十名学生，强半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今日政府（指清廷）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学事务所之计划，此则余所以自慰者。

昔日轰轰烈烈的派遣留学生行动在保守派的干扰下无奈地落下了帷幕，而晚清政府则是更加风雨飘摇。国际上的环境已经容不得晚清政府明哲保身，唯有与世界相沟

通，方可能争得一席容身之地。虽然清政府所采取的接轨方式过于简单，对危机四伏的统治也没有什么帮助，但多少也迈出了第一步。

设同文馆，开展近代教育

咸丰十一年（1861）的一天，奕訢上奏朝廷，请求创立“同文馆”，其意在于培养外语翻译人才。辅政的两宫皇太后毫不犹豫地准奏，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便轰轰烈烈地开张了。

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实际管理日常事务。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同治八年（1869）起任总教习，历经25年之久。

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办。该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也是清朝在北京开办的采用班级授课制的第一所洋务学堂。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一开始，招生对象仅限14岁以下八旗子弟，结果6月份入学的就10个人；后来招生范围开始扩大，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均可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同文馆每3年举行大考一次，列入优等者升官阶，次等者记优留馆，劣等者除名。同文馆的学员待遇非常优厚，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官家供给外，每月发银10两。

学习期限初定3年毕业，但自光绪二年（1876）后改为两种：由外文而延及天文、化学、测地等各类学科的，8年毕业；年岁稍大，仅仅学习翻译的，5年毕业。课程设置在开始时只有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1867）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科目。除汉文外的其他课程大多由外国人担任教习。其经费、人事等权力基本被控制在总税务司赫德手中。

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极为统一，“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基本上不在课程设置之中，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就源于此。毕业后的学生多数就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等职。该馆所附设的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20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1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同治二年（1863）前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相继成立。

客居于上海的翰林冯桂芬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就曾提出“宜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颖悟儿童，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西国语言文字，并习经史算学”。李鸿章对冯桂芬的这一建议表示支持。

翌年，上海广方言馆于旧学宫（今学院路四牌楼相近）建立，昔日提出此议的冯桂芬被举荐为馆长。最初，上海广方言馆曾被拟名为“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这个名字曾经在李鸿章请设学馆的奏折中出现。不过在冯桂芬所拟试办的章程中，被改称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这也成为了当时所使用的正式名称。这个名字沿用了四五年，同治六年（1867）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

成立后的上海广方言馆培养出了一批精通西文和西学的中国学生。同治十一年（1872）8月11日，上海广方言馆的第一批30名14岁的学童，在陈兰彬、容闳的率领